

突破“禁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武观与美国大规模海外核部署

陈波

【摘要】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制定了以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能力为基石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并开启了大规模海外核部署的过程。然而,新战略和部署过程都离不开艾森豪威尔政府核武器观念的转变。无论是对“公开政策”还是对核政策长期影响的讨论,都推动了政府内部认知朝着核武器“可用”和“可部署”的方向发展,并从实践上打破了决策者头脑中存在的“禁忌”,消除了公众舆论和盟国当中可能存在的障碍,使在海外大规模部署核武器成为可能。

【关键词】美国;核武器;认知;部署

【作者简介】陈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教授(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143~15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防核扩散政策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1945-2017)”(20&ZD242)。

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原子能为和平》的演说,承诺“美国决心帮助世界摆脱原子能带来的可怕困境,并全心全意地促进人类的伟大创造力造福于生命而不是死亡”。^①然而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进行了160余次大大小小的核试验,其中1954年3月的氢弹试验更是造成了“比基尼事件”,核爆附近大面积海域被沉降的放射性物质污染,包括日本“第五福龙丸”号在内的300多艘渔船受到辐射影响。1957年,为避免在可能发生的核战争中伤亡,联邦政府批准五年内耗资250亿美元建设民防工程。在八年任期内,艾森豪威尔将核威慑放到整个战略设计的中心位置,却在几次重大的地区危机中最终并未动用核武器。因此,很多学者将他看作一个“自相矛盾”的人,在原子能政策上尤其如此。^②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是美国大规模向海外部署核武器的开始,这既是战后美国核政策、核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与美国高层如何看待核武器,特别它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地位、与常规武器的区别与联系、是否具备以及如何起到威慑作用等有很大的关

系。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收集到的美国解密档案,力图揭示核观念、核政策的变迁与大规模海外核部署行动之间的关联。

一、杜鲁门政府的核政策遗产与“新面貌”的出台

1953年,新的共和党政府从前任继承而来的核武器政策在方方面面并不统一,甚至意见纷纭,这无疑模糊了艾森豪威尔的政策视线。所以,重新调整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位置势在必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出台,既与杜鲁门时期的核政策不可分割,又与新总统对核武器的认知密切相关。在核武器能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这两个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逐步突破层层“禁忌”,在政策思维上让核武器大规模在海外部署成为现实。

应该说,美国总统在核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是杜鲁门政府时期确立的。1948年9月,杜鲁门政府通过NSC30号文件《美国核战争政策》指出,“使用核武器属于最高层决策”,列出使用原子武器的必要程序和需要考虑的因素,明确“使用核武器的最终权力属于总统”。^③这一文件的重要意义在于,核决策虽然参与部门和人员众多,^④但每一位总统及

其重要閣僚的观念、思路无疑最为重要。

轰炸广岛、长崎以后,美国政府内部围绕原子弹产生了很多争论,其中有人认为使用原子弹会毁灭人类文明,也有人对原子弹的实际效果持怀疑态度。1949年12月,空军原子能战地办公室(USAF field office for Atomic Energy)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的《原子空战原则》,对核战争的属性有过一番评论。文件认为上述争论“本质上是新式武器出现的必然结果”,核武器虽有比较大的杀伤力,但其爆炸的特征和成本使其更适于袭击有一定规模的集群目标,而且目标选择和时间同等重要。当时满足目标和时间要求的只有轰炸机,不过这种投放方式的经济成本较高。^⑤战后初期,特别是中远程导弹诞生并服役之前,核威慑的实现主要依赖于战略空军的投放能力,因此美国空军这些对核战争的看法具有典型性。

离开投射工具,原子弹可以说毫无战略或战术价值。因此,任何包含核武器的计划都必须考虑这一点。除了远程投放之外,美国在杜鲁门时期就在探索海外部署的可能性,以缩短作战反应时间,增加核威慑的有效性。1950年6月,杜鲁门下令向英国部署未携带核弹头的核元件装备战略空军,开启了美国的海外核部署过程。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关岛又成为远东地区第一个部署核装备的地点。^⑥到后来,这类能够进行“准核存储”的地点不断增加,包括了摩洛哥、冲绳、格陵兰等地。^⑦随着核装置不断向海外转移,军方与原子能委员会之间因核武库监管的矛盾日益尖锐,核武器的使用及其部署遇到体制瓶颈。

1951年12月,参联会依据自身的职责和权力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美国核武库数量稳定增长,核武器已经成为大战准备和作战计划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参联会有责任根据美国现有的技术条件制定预防性的军事计划,并为总统在必要时刻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提供建议。因此“制定围绕核武器的军事行动方案是国防部的事,而核物质的生产和研发才是原子能委员会的职责。前者是消费者,后者是生产者。”在使用核武器的权限问题上,参联会完全支持总统做出是否使用的决定,但“核武器与其他

武器一起组成了战争的全部手段”,因而参联会“有权决定在何地、以何种方式,使用多少数量和何种制式的核武器”。文件还建议划分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分工和职责。^⑧国防部甚至“抱怨”因为核武器主要的监管权在原子能委员会,在转移和部署的过程中导致核信息泄露的可能性非常大,也使“时刻准备好使用”与“授权使用”之间的矛盾凸显,军方无法在军事上完全做好准备。

要研究艾森豪威尔本人的核武观,必须追溯他如何看待这种武器本身。他曾认为对日使用原子弹值得商榷,因为那可能会引发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应。^⑨艾森豪威尔当选后,有两个重要问题摆在他的面前:作为局部冲突的朝鲜战争和具有极大破坏力的氢弹诞生。这些都促使其核武器观念逐步发生了与其身份相应的变化。在他看来,原子能之于美国国家利益在目标上是多维度的,核技术可能同时带来危害与安全、恐惧与希望,甚至是罪恶与善行并存。^⑩杜鲁门执政最后一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是110亿美元,但艾森豪威尔在上台后的半年内就将赤字砍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朝鲜战争结束后对国防支出的削减。^⑪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新政府最大的政治目标就是以最小代价避免冲突的升级,以便使美国更加关注经济。在1953年7月底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汇报了苏联经济的复苏,以及在军事上对美国构成的压力,让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苏联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对手,必须从长期来规划对苏战略。^⑫朝鲜停战让他可以从减少国防支出的角度考虑经济,而对于核武器,艾森豪威尔更多是看到它可以作为削减常规力量、减少国防开支的手段——其实这正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出发点。当年10月,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出台,该政策又被称为“新面貌”(The New Look)。新战略将美国的安全基石建立在“以打击力量实现大规模报复的能力”之上,其实就是“以大规模的核能力为基础”。^⑬这表明艾森豪威尔将核武器作为战略支撑点,在保持美国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与苏联进行持久战。

到了1953年,核技术的发展使核武器更具备实用特征。当年5月,原子能委员会宣布成功使用280毫米火炮发射了核弹头。^⑭《纽约时报》甚至爆出新

闻,“第一支美国陆军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将在年底开赴欧洲,履行北约军队的职责”,而且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计划“以解决将来把存储在美国国内的核武器转移到欧洲大陆去的问题”。参议员阿尔伯特·戈尔(Albert Gore)据此写信“询问”艾森豪威尔是否属实。一个月后,总统特别助理予以回复,首先认为这种军事情报不应该公开讨论,其次声称无论现在是否已经制定部署计划,在国际法范围之内的准备工作都是合理的。最后,他结合刚刚试射成功的280毫米火炮的问题,指出这种武器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发射“高能炮弹”,因此携带核弹头并部署到世界范围内实属正常。^⑤

无论是从核技术出发,还是从核政策本身来说,艾森豪威尔政府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而要理顺因核武器使用和部署带来的各种复杂关系,首先要解决好上述媒体报道引发的“公开”问题,为新政策的实施做好国内外的舆论准备。

二、“公开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

1952年4月,就在美苏先后首次进行氢弹试验中间一年,原子能事务助理国务卿曾向杜鲁门政府提交备忘录,提出了对核武器信息公开的问题,因为它涉及与民众、盟国乃至苏联的关系,是一项具有政治意义的事务,美国势必会在2~5年内面对这个问题,因此,现在有必要考虑公开的内容、可能的影响以及公开的时机。^⑥可见,有关核政策和信息的“公开”建议早已有之。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1953年5月底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会”)会议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卡特勒(Robert Cutler)专门邀请奥本海默参加。后者指出要更好地制定美洲大陆的防务计划,美国必须加强宣传和教育,使民众、国会甚至盟国“知情”,从而意识到国家面临来自对手的强大压力。他将这一政策称为“公开政策”(policy of candor)。^⑦为了确保信息公开的安全性,艾森豪威尔要求心理战略委员会在每次公开信息之前草拟声明文本。

这次会议最终修订了当月初制定的NSC151号《军备与美国政策》文件,敦促政府采取“公开政策”,使美国人民了解美苏核军备竞赛的状况和现实,以

期获得民众对预防性战争的理解和支持。这一政策并非一时之计而是长期策略。至于何种信息可以公开以及何时公开,具体将由心理战略委员会根据当时原子技术及政策信息进行甄别和选择。这一政策的第二个目标是与主要盟国分享信息,通过加深它们对核武器政治和军事上意义的理解来增加它们分担责任的意识,提高他们在处理共同防务问题上的能力。^⑧“公开政策”的重要性在于,美国政府不仅要统一内部认识,而且要在民众和盟国中促成某种“共识”,从而创造出有利于核政策进一步推行的外部环境。

1953年12月4日,国安会据此进一步形成了NSC151/2号《向盟国公开原子能信息》文件,指出政策的目的是:促进盟国更好地参与自身防务以及同美国的防务合作;在危机中与美国协调一致,特别是需要使用核武器时给予美国支持;积极发展民防以减轻美国在战争期间的负担;推动盟国在核能计划方面与美国的合作,提升自由世界整体的核研发水平;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与盟国核信息分享的范围,包括核武器的效能、核武器的战术和战略使用方式、苏联核储备和投射能力情报等。文件还限定了不得与盟国分享的核情报,其中就包括核部署一项,特指核武器部署的详细信息。^⑨

1954年4月北约国家召开外长会议。在专门讨论核武器的发言提纲上,杜勒斯希望就“美国官方”对核武器的想法予以澄清:“与其他自由世界一样,美国的主要目标是遏制侵略以及阻止战争的爆发。在我们看来,核武器能够在达成这个目标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美国认为足够的报复能力(capacity for retaliation)是将战争可能降到最低的有效手段。杜勒斯尤其强调“能力”一词,因为他认为,苏联动用武力靠道德因素无法阻止,只有使它担心遭到报复才有可能阻止。因此,能够使用核武器很重要,否则北约的安全将会受到严重威胁。一句话,“当前必须将核武器视为常规武器的一种”。当然,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会与盟国保持协商。^⑩此种说明,可以看作是在“公开政策”大背景下,美国同盟国就“核威慑”理论做出的一番解释,以提前化解因使用或者部署核武器与盟国之间产生的潜在矛盾。

1955年3月15日,杜勒斯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随着战术核武器的发展成熟,战略力量在大战中的作用遭到削弱。这一下引起了空军方面的不满,他们通过原子能事务助理国务卿向杜勒斯建言:原子弹地表爆炸必定会引起“放射性尘埃”问题,无论如何小型化都不可避免,必须消除“核战可以限制在不会大规模伤及平民的范围内”这种想法。^④核武器可用性的争议并没有因战术核武器的产生而终止。

1956年1月,杜勒斯批准了一份关于核武器发展与美国安全战略的备忘录,指出随着苏联核技术的发展,美国国际战略可能会出现問題。原有的军事战略是在大战发生时,欧亚大陆的盟国有足够的力量大大延缓对方侵略的时间,从而为美国战略空军对敌进行核打击赢得时间。但是,目前国际上对核武器的反感情绪已经严重到可能会削弱美国作为同盟的价值,影响到“集体防务”观念,也让盟国的信任和能否使用海外基地成问题。^⑤

尽管政府内部和盟国之间对核武器的真正威慑作用存在多种声音,军方却不断加紧武器装备研发的步骤,力图配合美国核政策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和“实战”的需要。1954年5月14日,参联会向原子能委员会提交了陆军方面提出的备忘录,他们得知加州大学在研究一种型号小、当量小的核弹。在当前投放装置允许的情况下,该核弹将增加部队的灵活性,甚至会开辟新的作战方式。因此,参联会敦促原子能委员会应优先考虑这种核弹的研发。^⑥与此同时,军方还要求加速生产240毫米火炮核弹发射装置,以增强地面武装的打击力量。^⑦当年12月1日,根据参联会JCS 2012/56号备忘录,陆军方面要求“研发一种可以配置给奈基I型导弹的核弹头”,以增加空防能力。从作战能力来讲,装备该弹头将极大提高杀伤力;而这种低当量弹头,对空打击时不会对地面有较大影响;如果敌机携带核弹,携带该核弹头的奈基导弹可以在摧毁敌机的同时,大幅度破坏敌方核弹。现有奈基I型导弹部队已经部署完毕,陆军方面希望1956年可以装备该核弹头。^⑧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政策从制定到具体执行,始终存在不同部门的观念差异、利益纠葛,这不仅造成了政策思维和逻辑的混乱,也成为艾森豪威尔本

人对核武器看法存在诸多矛盾的根源。这种局面最终导致美国政府不得不从长远角度重新讨论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地位和影响。

三、美国政府内部对核武器长期政策的讨论

随着对核武器及中长期核政策的争论不断深入,“核武器发展对人类的影响”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1955-1957年间的一个重要议题。^⑨1955年10月,该议题在第260次国安会会议上首次被提出,并特别指出要限制研究这一课题的参与者的范围,严防国家安全政策的泄露。^⑩次年3月,按照国安会的要求,就“核武器发展对人类的影响”这个问题专门组成了一个工作组,成员包括医学、人类学、社会学教授和企业、智库代表,目的是考察美国国民在核时代对核武器、核战争的态度和接受程度。工作组在11月提交了最终的报告,总体上认为:在没有充分防备的情况下,如果对美国的核袭击导致的死亡预期超过5000万,公众对国家政策的支持将经受严重考验且会导致国家分裂。虽然政府做了很多信息公开的工作,但是并没有很好地传递给他们。要改变这种状况,政府需要制定“计划”改善民众的心理状态,比如加强民防建设。同时,还要考虑改变其他国家对核武器影响的认识,以在未来核大战中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性。^⑪

1956年7月,国务院内部文件着重分析了核武器在美国长期的政策设计中的作用。文件认为,苏联在一段时期内常规力量会保持一定规模,而美国和盟国可能会逐步削减武装。一旦美苏力量失衡,苏联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它不担心会遭到报复性反击。即便是苏联不敢冒“人类自杀”的危险首先使用核武器,它也会利用常规力量的优势对西方施加政治和外交上的压力。但是,核武器在政治和军事上并不具备“可使用性”,因此文件的最终基调是,美国应在保持最低报复能力的前提下,对常规力量予以更多的重视,同时大力发展洲际导弹技术。^⑫这可以看作是美国政府正在反思和准备调整“大规模报复”战略,并向“有限战争”和“灵活反应”转变的思想雏形,而向海外部署战术核武器成为加快这一进程的有效手段。

1957年2月的国安会会议上,核战争又作为第

一个议题被讨论。根据前文述及的工作小组起草的文件初稿,艾森豪威尔对其中“如果没有充分防备,核袭击会导致5000万人丧生,民众最终不会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而最终使国家走向分裂”这一表述最为关注,认为按照当前美国的军事规划,只在海外部署6个师的兵力是无法避免使用核武器的。他还提出民防计划对威慑苏联是没有意义的。^④对现有常规力量和国内民众认同不足的认识,让战略核武器“威慑力”的有效性成疑。而“有限战争”和战术核武器则可能是弥补这种不足的一种选择。

传统上,“战争规划”一直跟国务院“没关系”。但是,核武器出现后,这种规划就不仅仅是一项“专业工作”了。1957年6月,国务院内部要求在涉及核武器的军事规划过程中增加民事官员的参与。因为随着核武器破坏力的增加,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越来越依赖于美国人民对核战争的了解,民事机构和官员也需要对防务政策中的核武器问题有更好的理解。况且,总统一人无法承担所有对核武器规划特别是使用问题的判断。一旦动用核武器,国安会也无法在爆炸、辐射等方面协助总统进行完善的决策。^⑤

海外核部署作为一种政策选项被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军方和高层对“世界大战”和“局部战争”关系的认知变化。从对1956年10月参联会成员发言和国会证词的整理中,我们能看出美国决策高层越来越意识到,局部战争可能导致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战,如果想避免这种结果出现,反而“要有能力和充分的准备应付局部战争”,或者说,“在局部”要有足够的“威慑能力”来震慑对手、阻止大战的爆发。在这方面,海外驻军、战术核武器的部署甚至在局部战争中的使用都是具体的威慑手段。^⑥11月21日,当再次讨论部署核武器问题时,艾森豪威尔似乎并无太大“异议”转而强调“安全存储”。^⑦他还要求参联会对部署做出恰当的评估,并且同国务院协商。参联会主席雷福德(Arthur W. Radford)当即表示会妥善处理。

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有关核政策的讨论和协调,特别是对核武器认知的变化,不断强化战术核武器在核战略中的重要性,也不断地将权力的天平向

军方倾斜,同时力图在政府内部、国会、民众和盟国的不同层次上推进“思想统一”,为核部署转变成一项清晰可见、切实可行的核政策做了铺垫。1957年年底至1958年年中,华盛顿陆续向欧亚盟国的军事基地部署了“忠实约翰”“屠牛士”及8英寸榴弹炮等武器装备。至1961年肯尼迪上台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部署总数达到1740枚,而在北约盟国则达到3929枚,^⑧海外战术核武器的威慑能力初具规模。

四、结论

经历过大大萧条、二战以及冷战初期的艾森豪威尔,他的安全观是复合的,“他将很多因素融入了国家力量——飞机、地面力量、战争能力、工业、经济以及人民的精神。他将这些混合在一起以确保美国的安全”。^⑨而核武器在这其中似乎成为连接各种因素的中心环节。“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制定为艾森豪威尔在海外部署核武器提供了政策依托,而核武器和投放手段的发展又使部署有了技术支撑。事实上,技术变革与战略思维是彼此促进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内部围绕核武器的争论及认知变化,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本人的价值取向、各部门的利益博弈,甚至美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海外核部署正是这复杂过程的一种结果。

艾森豪威尔政府将核技术看作能够给国家安全带来巨大利益的事物,因此试图转变“核武器是危险且不道德的”认知。艾森豪威尔不断鼓动将核武器界定在“可以接受的使用”范围内。在他的核政策中,安全和和平可以混为一谈。为此,他在任内致力于两件“自相矛盾”的事:一面积极鼓动和平利用原子能,甚至推动禁止核试验协议的达成;而另一面却大力发展核能力,并开启了大规模海外核部署之路。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时美国拥有841枚核弹头,而到他卸任时已经达到18,638枚,总计24491百万吨当量。^⑩核武器的数量增长22倍,而爆炸力增长400倍。原来美军只能依靠B-52战略轰炸机投放核弹,到20世纪50年代末已经发展出更多的方式——KC-135空中加油机大大延伸了B-52的覆盖范围,“朱庇特”“屠牛士”“雷神”以及“北极星”导弹逐步装备给陆海空三军。

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加关注核武器的战略层面而

非技术层面,这更容易让艾森豪威尔接受核武器可用于实现战略意图、可以大力发展的观念,而将核武器的道德问题置于一旁。“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核战争的风险无法超越在国家实力、遏制共产主义和追求和平上带来的更直接、可见的好处。”^①如此看来,艾森豪威尔本人在核武器问题上也确实是一位持双重标准的“机会主义者”。

注释:

① "Atoms for Peace" Address Before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on Peaceful Uses of Atomic Energy, December 8, 1953, available at <https://www.eisenhowerlibrary.gov/eisenhowers/speeches>. 在线时间:2020年11月3日。

②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政策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将艾森豪威尔描述成一个积极的、在核政策形成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人,一位有着自己独立且系统思考的决策者,而且首先追求的是核时代的和平。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艾森豪威尔在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不宜被夸大,官僚机构的作用不容忽视,其政策本质是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本文将艾森豪威尔及其“政府”的“核武观”作为整体来考察,力求避免偏颇和疏漏。有关这一问题可参考 Richard G. Hewlett and Jack M. Holl, *Atoms for Peace and War, 1953-1961: Eisenhower and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H. W. Brands Jr., "The Age of Vulnerability: Eisenhower and the National Insecurity State",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4, No.4, 1989, pp.963-989; H. W. Brands Jr., "Testing Massive Retaliation: Credibility and Crisis Management in the Taiwan Strait",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2, No.4, 1988, pp.124-151; Jeremi Suri, "America's Search for a Technological Solution to the Arms Race: The Surprise Attack Conference of 1958 and a Challenge for Eisenhower Revisionists",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21, No.3, 1997, pp.417-451; Martha Smith-Norris,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uclear Test Ban Talks, 1958-1960: Another Challenge to Revisionism",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27, No.4, 2003, pp.503-541; Chester J. Pach and Elmo Richardson, *The Presidency of Dwight D. Eisenhower*, Revised Edition,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91。

③ "United States Policy on Atomic Warfare", September 10, in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USDDO)*, Farmington Hills: The Gale Inc., 2019, CK2349353727。

④从1954年4月成立的行动协调委员会核能工作小组成

员可以看出,艾森豪威尔时期核武器政策参与的部门包含但不限于白宫办公厅、国务院(核能事务司及后来的军控与裁军署)、国防部(含参谋长联席会议)、原子能委员会、中央情报局、新闻署、联邦民防局。"Coordination of Nuclear Energy Projects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Programs", April 28, 1954, in White House Offic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Papers, 1948-61, OCB Central Files Series, Box 8, Abilene: 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DDEL); "Terms of Reference for Working Group on Coordination of Nuclear Energy Projects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Programs", May 13, 1954, in RG306, Office of Plans, Coordinator for NSC and OCB Affairs, Subject and Policy Paper Files, 1953-1961, Box 22, College Park: National Archive II(NARA)。

⑤ "Doctrine of Atomic Air Warfare", December 28, 1949, in USDDO, Gale, 2019, CK2349385401。

⑥ Robert S Norris, William M. Arkin & William Burr, "Where They Were", i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55, issue 6, 1999。

⑦ "Summary of Policies Approved by Presidents Harry S. Truman and Dwight D. Eisenhower Regarding Nuclear Energy, Nuclear Weapons, and Nuclear Warfare", June 26, 1952, in USDDO, Gale, 2019, CK2349473573。

⑧ "Joint Chiefs of Staff Views 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terest in the Use of Atomic Weapons", December 11, 1951, in RG218, Central Decimal File, 1951-1953, Box 159, NARA。

⑨ Dwight D. Eisenhower, *The White House Years: Mandate for Change, 1953-1956*, NY: Doubleday, 1963, pp.312-313。

⑩ Brian Madison Jones, *Abolishing the Taboo: Dwight D. Eisenhower and American Nuclear Doctrine, 1945-1961*, Solihull: Helion & Company Limited, 2011, p.87。

⑪ Gates Brown, *Eisenhower's Nuclear Calculus in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RMB Deployment in NATO Nations*,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18, p.16。

⑫ "157th Minutes of Meeting", July 30, 1953, in Eisenhower, Dwight D.: Papers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3-1961(Ann Whiteman File), NSC Series, Box 4, DDEL

⑬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Basic. NSC 162/2", October 30, 1953, in USDDO, Gale, 2019, CK2349391157。

⑭ "First Atomic Shell Fired from a Gun Opens Still Another Phase of Military Tactics", *New York Times*, May 31, 1953, in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2019。

⑮ "Letter from Senator Albert Gore to the President Eisenhower", June 3, 1953; "Letter from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Wilton B. Persons to Senator Gore", June 27, 1953, in Dwight D. Eisenhower: Records as President(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1953-61, Confidential File, Subject Series, Box 9, DDEL.

⑩"Political Implications", April 16, 1952, in RG59,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olitico-military Affairs, Subject Files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Atomic Energy and Aerospace Affairs, 1950-1966, Box 6, NARA.

⑪"Discussion at the 146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ay 27, 1953, in Eisenhower, Dwight D. Papers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3-1961(Ann Whiteman File), NSC Series, Box 4, DDEL; also in USDDO, Gale, 2019, CK2349-162399. NSC151号文件涉及向盟国提供核武器信息的政策。

⑫"NSC 151: Armaments and American Policy", May 8 and November 23, 1953, in USDDO, Gale, 2019, CK2349442127; CK2349442144.

⑬"NSC151/1: Disclosure of Atomic Information to Allied Countries", November 23, 1953;"NSC 151/1 reDisclosure of Atomic Information to Allied Countries", December 4, 1953, in White House Office, Office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Records, 1952-1961, NSC Series, Policy Paper Subseries, Box 5, DDEL;"NSC Statement of Policy on Disclosure of Atomic Information to Allied Countries", December 4, 1953, in USDDO, Gale, 2019, CK2349177148.

⑭"Paper re Nuclear Matters for NATO Meeting", April 22, 1954, in Dulles, John Foster: Papers, 1951-1959, Subject Series, Box 4, DDEL.

⑮"Discussion with the Secretary", March 16, 1956, in RG59,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olitico-military Affairs, Subject Files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Atomic Energy and Aerospace Affairs, 1950-1966, Box 6, NARA.

⑯"Memorandum by John Foster Dulles re Nuclear Matters", January 28, 1956, in Dulles, John Foster: Papers, 1951-1959, Subject Series, Box 4, DDEL.

⑰"Very Small Atomic Weapons", May 14, 1954, in RG218, Central Decimal File, 1954-1956, Box 133, NARA.

⑱"Requirement for Development of a 240mm Atomic Projectile", April 2, 1954, in RG218, Central Decimal File, 1954-1956, Box 133, NARA.

⑲"Requir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 Atomic Warhead for NIKE I Missile", December 1, 1954, in RG218, Central Decimal File, 1954-1956, Box 133, NARA.

⑳对这个问题的档案文献,可参见 White House Office, Office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Records, 1952-1961, NSC Series, Briefing Notes Subseries, Box

9, Folder[Human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Development, 1954-57](1)-(4), DDEL。

㉑"272th Minutes of Meeting", October 7, 1955, in Eisenhower, Dwight D.: Papers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3-1961(Ann Whiteman File), NSC Series, Box 7, DDEL.

㉒"The Human Effects of Nuclear Weapons Development", November 21, 1956, in Eisenhower, Dwight D.: Papers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3-1961(Ann Whiteman File), Administration Series, Box 4, DDEL.

㉓"Long Range Foreign Policy Results of Dependence on Nuclear Weapons for Defense", July 6, 1956;"Long Range Foreign Policy Results of Dependence on Nuclear Weapons", December 26, 1956, in RG59, Central Decimal File, 1955-1959, Box 2877, NARA. 对此军方并不认同,早在1954年6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认为“美国在任何有美军基地的地方都可以部署和使用核武器”。参见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Security, and Economic Relations, 1960-1976, ProQuest, 2019, JU0001。

㉔"312th Minutes of Meeting", February 8, 1957, in Eisenhower, Dwight D.: Papers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3-1961(Ann Whiteman File), NSC Series, Box 8, DDEL.

㉕"The Need for Additional Non-military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 for the Employment of Nuclear Weapons", June 3, 1957, RG59,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olitico-military Affairs, Subject Files of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Atomic Energy and Aerospace Affairs, 1950-1966, Box 6, NARA.

㉖"Discussion of Peripheral War, the Use of Tactical Nuclear Weapons", October 11, 1956, in USDDO, Gale, 2019, CK2349427844.

㉗"In Discussing the Dispersal of Nuclear Weapons, the President Stresses His Desire to Have a 'Safe Reserve' of the Weapons on US Soil", November 21, 1956, in USDDO, Gale, 2019, CK2349429529.

㉘Robert S. Norris, "United States Nuclear Weapons Deployment Abroad, 1950-1977", in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History of the Nuclear Age Dinner Series, November 1999.

㉙ Robert J. Donovan, Eisenhower: The Inside Story, New York: Harper, 1956, pp.330-331.

㉚"Estimated U.S. and Soviet/Russian Nuclear Stockpiles, 1945-1994", in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November/December, Vol.50, No.6, 1994, pp.58-59.

㉛ Brian Madison Jones, Abolishing the Taboo: Dwight D. Eisenhower and American Nuclear Doctrine, 1945-1961, Solihull: Helion & Company Limited, 2011, p.10.